

本集主编 李运富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论文集

(第三集)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中華書局

本集主編 李运富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论文选集

(第三集)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论文选集. 第3集/李运富本集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4.4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09779-5

I. 民… II. 李… III. ①民俗学-中国-文集②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K892-53②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1817号

书 名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论文选集(第三集)
本集主编 李运富
丛 书 名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8 插页2 字数445千字
印 数 1-8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779-5
定 价 98.00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总序

李国英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系列性的研究丛书,《丛刊》的主要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中心研究人员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由中心组编由海内外学者完成且与中心研究目标一致的高水平学术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建于2000年9月。其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以及原中文系古典文献学科点的一部分。中心创建时的学术目标是将我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开创的民俗学,以著名文学家启功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典籍文献学和由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陆宗达先生创立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结合在一起,从上、下层文化和语言文字载体三方面整理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传承与演变的规律,继承、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

在中心主任王宁先生的领导下,中心成立十年来,始终坚持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学术方向,把基础研究和社会应用紧密结合起来,把传统研究和现代化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在理论创新、服务社会和资源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中心坚持继承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十年来推出了一批有特色、成规模的标志性成果。如王宁先生在继承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不仅出版了纲领性的理论著作《汉字构形学讲座》,还指导博士生运用这一理论对历代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构形描写,出版了《汉字构形史丛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民俗学学科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是中国第一部以国家课题形式确定的系统的中国民俗史研究著作。该项目历时八年完成。2006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文献、考古、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做了动态的、多角度的系统描述与分析,使长期被忽视的中国民众生活史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展现。不仅总结提升了中国民俗理论,填补了中国学术领域的空缺,而且丰富了世界人类文化史。该著作出版后引起高度关注,2009年荣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第九界民间文艺山花学术著作奖”,2010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中心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着力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学术资源。中心利用自身的优势与资源为汉字的国家规范和国际标准的研制做出了贡献。如王宁教授主持的《规范汉字表》后期研制工作,李国英教授、周晓文教授长期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表意文字工作组(ISO/IEC JTC1/SC2/WG2/IRG)的古汉字编码工作。

中心高度重视现代化手段的运用,把传统学科的理论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中心组织完成了数字化《说文解字》教学系统与研究体系、甲骨文拓片资源库与原形字库及其检索系统、中国数字故事博物馆、数字化民俗地图与数据库和数字化故事民俗地图等大型的数字化成果。甲骨文拓片资源库与原形字库及其检索系统为国际标准化组织表意文字工作组的甲骨文编码工作提供了支持;中国数字故事博物馆于2008年12月赴香港参加文化部国际司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获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评。周晓文教授先后完成了小篆字库及输入法、甲骨文字库及输入法,两个字库及输入法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运用最广泛的古汉字字库及输入法。

经过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心积累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了使中心的成果能够系统刊布,经中心管委会研究决定组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丛刊》,为中心成果的系列化刊布提供平台,也为中心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提供桥梁和纽带。

《丛刊》将坚持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学术方向,坚持瞄准学科前沿、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的学术目标,坚持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学术品格,不断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繁荣我国的人文学科作出我们的独特贡献。

《丛刊》的主要内容包括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要研究范围内的民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这三个主体学科,以及由学科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学。《丛刊》将重点刊布中心承担的重大课题的专题性系列研究成果,同时也会按年度组编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论文选集、不定期的编辑中心组织的重要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为了培养学术后备力量,《丛刊》还会精选部分在中心工作的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以及由中心培养的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我们也欢迎来自海内外研究所研究的专家的成果纳入《丛刊》刊布。

《丛刊》的创建,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2011年3月

目 录

【汉字研究】

- 汉字与中华文化 王 宁 1
- 书写规则与书法艺术
- 纪念启功先生 100 周年诞辰 王 宁 13
- 汉字教育的理念与方法 王 宁 22
- 《说文解字》的析字方法和结构类型非“六书”说 李运富 42
- 《说文解字》“从某字”分析
- 许慎汉字形体分析研究之二 李运富 56
- “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 李运富 78
- 当代汉字系统优化的基本原则 王立军 96
- 汉字构形的地域变异 王立军 112
- 汉字发展中的跨结构变化 齐元涛 121
- 汉字发展中的成字化 齐元涛 符 渝 131
- 汉字构形系统的网络分析
- 以《说文解字》小篆构形系统为例 胡佳佳 140

【训诂与词汇研究】

- 谈训诂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趋势 王 宁 159
- 训诂学对义素分析法的证明与应用 王 宁 164
- 言外语境影响下的《毛传》直训分析 凌丽君 176

论汉语复合词的词素意义	李运富 190
论汉语复合词意义的生成方式	李运富 205

【现代汉语研究】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	刁晏斌 226
当代语法发展变化的宏观考察与分析	刁晏斌 239
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现状及思考	刁晏斌 258

【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

钟敬文先生对新时期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 ——兼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民俗学专栏的作用	董晓萍 273
猫鼠型故事的跨文化研究 ——兼论钟敬文与季羨林先生关于同型故事的研究方法	董晓萍 290
比较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与方法 ——以东方民间文学中的中日印越英雄回家故事为例	董晓萍 316
“文化空间”的民俗地理学研究	董晓萍 338
春节遗产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	董晓萍 355
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萧 放 362
北京端午礼俗与城市节日特性探赜	萧 放 375
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	萧 放 386
关于民间文学作品权益保护问题的思考	萧 放 393

【文献研究】

元人诗序概说	韩格平 399
《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科考古赋的考官批语	韩格平 414
华北历史民俗文献述论	萧 放 427

汉字与中华文化

王 宁

提要:文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交叉课题,对于汉字这种表意文字来说,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文化因素的介入,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每一个汉字个体上,都无法准确深入地理解汉字。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中反映出的文化现象,说明汉字起源在结绳之后,其主要精神源于八卦中的“夬卦”,受到鸟兽印迹可以分辨事实的启发,以及仓颉造字等等说法,虽然都属于传说,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字产生初期的历史文化状况,有的还是可以证明的事实。只要能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对汉字的起源是可以做出基本符合事实的推论的。第二部分阐释汉字字体发展和各种字体书写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汉字以篆书为界进入了今文字阶段,今文字的特点是以书写为前提的。正规书写之外,由于速写产生了变异字体行书和草书,对各种字体的书写需要提出分析的参数。文章举例说明了汉字书写受书写者的心理和汉字自身特点的影响,同时,社会历史文化对字体演变的发展也是影响很大的。我们可以从字体的特点寄去演变的事实中观察出很多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前人已经做了形象生动的描写,今人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效,这些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去借鉴。第三部分阐释汉字形体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不但存在在个体汉字构形的理据上,也存在在汉字构形系统中字与字的关系上,还存在在汉字演变的轨迹上,研究与彰显这些信息,说明汉字构形与

文化的互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论文提出了在论证汉字与文化关系时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强调阐释汉字与文化关系的科学态度和历史依据。文章虽然论证的仅仅是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文字与文化关系的一些普遍规律,申说了文字学与人类文化学互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汉字 中华文化 汉字起源 汉字书写 汉字构形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书”就是汉字。汉字在中国是自源文字,而且是表意文字中唯一的一种不间断的使用至今的文字,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字与中华文化互生互证,可以从很多典籍里看出。本文所要表述的是几个关于汉字与中华文化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汉字起源传说的文化阐释

《周易》就现有保存的版本而言,大约是周代的典籍,但它作为卜筮之书,记载的内容涉及的年代很早。《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东汉许慎所做的《说文解字序》引用了这段话。魏晋的《文心雕龙·练字篇》也说:“夫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也。”这些说法虽然有传说的成分,但显示了先秦时代关于汉字起源及早期汉字性质和特点的认识:

结绳说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历史事实。《庄子·胠篋》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可见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关于结绳记事方法的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

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的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

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这些信息,才可以将数量繁多的信息保持长久。社会发展 to 一定的阶段,人们的交往渐渐成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时,相互约定的事情,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相约者共同遵守、长期遵行。前者属于个人信息的存留,后者属于社会人际关系的约定,这些内容都需要超越时间的限制,这就是结绳的“治事”作用和“各执以相考”的约誓作用。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初露端倪。

但是,绳结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绳结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再加上,结绳是一种难以突破空间限制的纪事的实物工具,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这种记事符号尚能适应,当人类交往的范围日渐扩大,信息的远距离传递需要突破空间限制的时候,它的局限就更为突出了。于是必然引发人类想出更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大量信息的存留问题。

汉字起源于八卦的传说,和《说文序》所说的“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的说法,与文字精神取自夬卦之说,彰显了另一个造字的理念:作为文字符号,造字的第一原则是:符号之间一定要有区别。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蹏远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这一点,从汉字象形系统中也可见其端倪:

金文的“番”,义为兽足,上从“采”(biàn),下写“田”,田是兽足的形状。其实,“采”是“番”的古字,《说文解字》中“采”与“番”已分化。“番”仍训“兽足”,古文作

“𠄎”，“采”则训“辨别”，而且“读若辨”，也就是说，古代文献不写“采”而写“辨”。从汉字构形可以看出，从“采”从“番”的字都有“仔细观察”、“分析”等意义，如“审”当“仔细辨别”讲，“释”当“分别物类”讲，“悉”当“详尽明白”讲……这些都可以看出“兽足”和“分别”意义之间的关系。古人靠辨别各种足迹来得到鸟兽活动的信息，避猛兽而猎获食物。所以，人们逐渐懂得，不同的图像纹路可以标示不同的事物、意义。从鸟兽足迹的辨析而得到图画、象形文字的启发，是合乎逻辑的。

这里还要说到“夬卦”。“夬”干下兑上，其爻五阳一阴，“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易经注》：“夬，决也。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夬卦在三个方面与文字的性质特点相合：首先，“夬扬于王庭”，与文字“王政之始”的功能相合，他的卦象以刚消柔，与君子的“施禄”“居德”相关，又与文字的“经艺之本”的作用一致。决有分决的意思，又有决断的意思，与文字符号的最本质的特点也是吻合的。用《易》解释万物虽然是汉代的学术时尚，但其中也反映了古人对表意汉字本质的认识。

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汉字起源的传说中，充分说明了表意文字的主要特点，探索了汉字起源发展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彰显了汉字在政治和文教上的功能作用。

二、汉字字体与书写中的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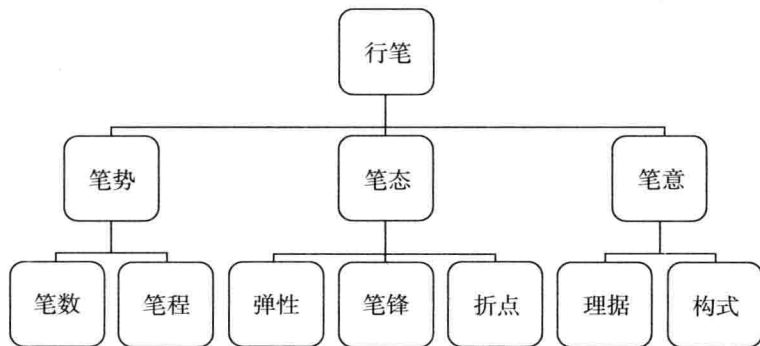
汉字的字体以篆为界，进入今文字阶段，也就是进入用笔书写的阶段。自今文字始，书写成为汉字发展的重大推动力。字是写成的，光研究写好的字不关注字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完整的汉字学，因为，静态的研究很难深入开掘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无法对汉字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自唐代开始，对书写的关注日盛，汉字的研究也走入了更加深入的阶段。

对不同字体风格的描述展现了汉字书写的文化心理，唐代的“书势”学说反映出大量的书写现象。唐张怀瓘《六体书论》对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六

种字体的风格气势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对大篆的风格描绘说：“（大篆）广乎古文，法于鸟迹，若鸾凤奋翼、虬龙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曲若弓，铍利精微，同乎神化。”对小篆的风格说：“或镂纤屈盘，或悬针状貌，鳞羽参差而互进，珪璧错落以争明。其势飞腾，其形端俨。”他提出了“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的比喻，对速写变异字体的特点作了十分形象的界定。

还必须注意的，是现代的书写文化。启功先生对书写的运笔，创建了“理趣说”，他以笔的六面行动——前后左右提按——为“理”，“理”是运笔可能行动的方向。按理写字的姿势或席地而悬腕，或临桌而贴腕，均需“指腕不死”。又需“轨道准确，如走熟路”，这些都是写字之常法。总结这些常法，纠正历来的误解误传，建立的是基础写字学。这使书法文字学免去了神秘虚玄，任何人都可以起步。但是，书法艺术又不是仅仅循理依法实行就可以达到的，在“理”与“法”的背后，还有一个“趣”字。要“解其笔趣”，既见笔，又见字，位置聚散不失度，点画顾盼不呆板，“行笔如‘乱水通人过’，结字如‘悬崖置屋牢’”。这些属于更高层次的艺术写字学。

汉字运笔可以采用以下参数来分析：



表意汉字书写的结字分布，也呈现出一些文化现象。例如：汉字的左右结构让就时，笔画少的让笔画多的，但不论是否均匀、何种让就，永远是左紧右宽。汉字的上下结构分上覆下与下承上，在布局上不论是否均匀，永远是上紧下宽。

这些，都是书写中反映出的文化现象。

三、汉字形体中携带的文化信息

汉字是根据它所记录的词（语素）的意义而构形的。构形时，需要选择一种形

象或形象的组合,将其生成字符,来描述它所记录的意义,我们把这个选择形象生成字符的过程称作取象,取象所表达出的构字意图称作构意。构意和取象都要受到造字者和用字者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的影响。因而,汉字的原始构形理据中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甲骨文中,动物的原始构形理据反映人类对动物特征的认识。例如:



这些四足动物,文字的取象如果粗疏了,很难加以分辨。在比较中可以看到其中的构意——象突出长鼻,鹿突出两角,马突出奔跑时竖起的鬃毛,虎突出身上的花纹和张开的虎口,豕(猪)突出大腹,犬(狗)突出向上卷起的尾巴,鼠以碎食物突出其觅食的行为。只有牛羊只描绘头部。我们把这些构形类聚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信息:汉字处在表形文字阶段时,人类的生活与动物的关系还十分密切,不但对野生动物的驯兽能够细微观察,就是对一些猛兽也有近距离接触的生活经验。在甲骨文中,取象于动物的形体十分丰富,显然是狩猎生活在文字构形上的反映。

《说文》小篆反映了周秦时代的文化,在汉字构形上,小篆对形声字的义符进行了规整,这就使它的构形系统与表义系统合流。“草木竹禾”是《说文解字》中表示植物的四个大部首。它们所辖字的总数达 1195 字,约占《说文解字》总字数的 12%,四大部首所从字的数量如下表:

	艹	木	竹	禾
正篆	445	421	144	87
重文	31	39	15	13
总计	476	460	159	100

植物类部首比例增多,这是因为中原地带在秦汉时代的生产已经进入农耕为主,人类生活与植物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时的汉字构形已经进入形声为主的阶段,汉字的造字取象于植物的数目大量增多,而表现为利用形声字的表义偏旁来分类。

四个部首的划分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说明古人对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已经分得很清。在草本植物中，自然野生与人工种植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种禾叫“种”，种树叫“植”，两方面的动词也已经分立了。竹，现代归禾本科，分布在亚热带地区。《说文》解释作“冬生草也”，可见也是把它看成草本植物。“竹”部首的确立说明，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文化已经与黄河中下游文化有所交融。

表意文字形声字类别的变化，往往反映出社会的发展。例如：在小篆里，器具中从“鬲”的很多。“鬲”“鬲”都从“鬲”，因为它们主要是陶制的，后来“鬲”写作“锅”，“鬲”写作“釜”，字都改为从“金”，反映了青铜器时代的文化信息。陶器已经很少使用，器皿以金属制品为主了。

小篆“又”与“寸”的分立，也反映制度带来的观念变化。酒器的“尊”甲文写作媿，金文加上八，表示酒倾而出。小篆承袭金文，而将下面的两手改为“寸”作“寸”，这是因为古人以酒器定位，“尊”已发展出“尊卑”之义，而小篆中的“寸”含法度之义，改从“寸”，正是适应“尊卑”义而为之。同样，酒器的“爵”因象雀形而名，甲文、金文都是象形字。小篆作曲，上半部是金文的变体，下从鬯，表示盛酒，从“又”，以手持之，以后也改“又”为“寸”，仍是为了适应“爵位”这种等级制度的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应当从“又”的字，都是表示用手操作的事物，到周秦时代的篆隶中，有相当一部分演变成“寸”了，除“尊”字外，还有“封”、“射”、“尉”等，小篆新造的“耐”、“寻”、“道”、“辱”、“寺”等字也从“寸”。这是因为，“寸”的构意表示法度，周秦的等级制度使法度观念被引进造字，才产生了这种构形的演进。这种变化，是社会变化与人的意识变化的反映，可以从中观察汉字携带的文化信息。

汉字的分化孳乳，既受语言的推动，又受文化的制约。例如：

“享”字甲文写作苟，象宗庙之形，本义是进献祭物。《说文解字》有菝与菝两形，解释作：“菝，献也。从高省，曰象进熟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享之”。汉代以后，这个字逐渐分化为三个形音义不同又互有联系的字：（一）“享”，音“许两切”今读 xiāng³，具有“享献”与“享受”两方面的意思，符合汉语施受同词的特点。（二）减一笔作“亨”，读“许庚切”，今读 hēng¹，主要意义是“亨通”，通于上即得到鬼神的福佑，所以引申为“顺利”、“运气好”。（三）加“火”作“烹”，读“普庚切”，今音 pēng¹。这是一个后出分化字，专门承担“烹饪”的意思。三字分化充分反映了古代宫烹饪的重要特点，即：供给活人膳食与供给鬼神祭品是烹饪的两大目的。“享献”与“烹饪”

用字的同源,并不是这两个意义的逻辑上的相通,而只是因为某种文化现象而相关。

构形与表义系统可以看出文化的观念,还可以以味感字为例。“酸”与“醜”(辛)构形都与酒有关。“咸”与“𩚑”(苦)构形都与“卤”即盐有关,说明这两个系统的味感都是从实物中体会出来的。唯有“甘”“甜”从“口”从“舌”,是无味之味,也就是一种经过谐调没有不适之刺激的味感。我们可以因此理解五味的系统:甘(以及后来孳乳出的“甜”),是本味,原味,入口无刺激,似乎无感觉而实际上是一种舒适感。《春秋繁露》说:“甘者,五味之本”,《淮南子·原道》说:“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春秋繁露》说:“甘者,五味之本”,《庄子·物外》说:“口彻为甘”。酸、辣、咸、苦都是别味,入口有刺激感。所谓调味,指中和多种别味,使其适中,达到“和”的高标准。在五味中,甘与其他四味的总体形成对立,又与其他四味分别对立:甘与咸是调味的增减因素,加盐则五味均可加浓,调以甘滑则五味均可淡化。甘与苦是调味的疾缓因素,所以有“甘而不固”、“苦而不入”之说,甘与酸不但表现在调味上,还表现在果实的生熟上。果熟则甜,果生则酸。上述味感字的构形特点,恰恰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词义系统。在这里,汉字可作为上古中国人分辨五味观念的确证。

以上各种事实说明了,就是汉字构形及其系统与历史文化有互证的作用,这种互证的作用反映了微观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四、汉字发展的文化因素

汉字是社会的创造,也是具有社会约定性质的符号系统,因此,它与社会其它文化项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要讨论汉字和其它文化项的关系,首先要引进社会文化三个层次的理论。钟敬文先生在《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471页)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他又说:“从文化根源上讲,三层文化都发源于没有阶级时代的原始文化。它们曾是一个统一体,后来却分化了。”用这个历史唯物的观点来衡量汉字,可以看到汉字发展不同的文化层面:

汉字的酝酿萌芽应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而它的发展成形已经是有阶级的时代。汉字的原初状态是三层文化没有分化的时代的反映,它代表全民族的通约。但汉字的第一次整理和较大规模的使用必然是上层社会的宫廷行为。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把文字的作用归纳为“王政之始,经艺之本”,说明汉字的早期发展是与上层文化同步的。一部汉字发展史证明,汉字的丰富、繁衍与中下层文化密不可分,而汉字的精密、规范、统一却主要是上层文化发展的反映。汉字的起源与发展融汇了中华民族三层文化的创造性,汉字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现象也是这三层文化综合的反映。清理汉字与不同层次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研究的重要的课题。

一部汉字发展史还告诉我们,汉字与其它文化项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关系。原始汉字与宗教、生产、生活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到汉字的早期统一时代,它与宗族继承权、分配制度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汉代以后,汉字与法律、外交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当汉字走出宫廷,进入市民文化后,一方面是汉字实用性增强引起的构形简化;另一方面却是上层统治者汉字规范意识和行为的增强。汉字是在两种文化的双向影响下发展的。始终影响汉字发展的要素是教育。隶变以后,艺术对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不间断的影响。这两个文化项,成为汉字发展最密切的背景和共进的伴侣。探讨各文化要素推动汉字发展的着力点,弄清各文化要素影响汉字发展的外在现象和内部规律,梳理影响汉字发展各要素使汉字发生变化的综合效应,是汉字与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们把第二个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称作宏观意义上的关系。它与上述微观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关系角度虽然不同,但彼此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这两方面,大致可以涵盖汉字与文化的全部关系。如果我们的研究逐步形成系统,则可创建出汉字学的一个分支——汉字文化学,并包括微观汉字文化学与宏观汉字文化学两个方面。这应当是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五、防止汉字与文化关系问题上认识的误区

(一)正确认识汉字构形分析的社会性、系统性带来的客观性

首先是在解释汉字构形中存在哪些文化内涵时,要防止主观臆测。有人夸大